

# 現代著名佛學家王恩洋居士的一生

李豫川

王恩洋居士，字化中，四川南充市集風場水龜山人。他的一生，主要從事佛學研究和弘法活動，旁及儒教思想的宣揚。著述等身，議論風發，深入淺出，風行宇內，道德文章，天下爭傳，為現代佛學界和學術界的著名人物。

王居士之先祖為三國蜀漢時期鎮北大將軍、漢安侯王平（？——248年）之後，世居南充（即漢魏之漢安縣）。祖父王杠，父親王思敏，母張氏。王恩洋生於清光緒廿三年（1897）農曆四月十八日。其父青年時為塾師，以舌耕為業。後從商，直道守信，被選為族長。平理諍訟，任勞任怨，廉介公正，不謀私利。淡於交遊，亦不迂於世；敬慎寡欲，終生如一。其母性情和順，勤儉忍苦；心地慈悲，敬老憐貧；見人憂苦，雖疏遠者亦必憫恤之；聞一善，則終生服膺不忘；嚴正守禮，無綺語妄心；教子有方，常告誡兒女勿捕害蟲鳥。但她一旦決定了要做的事，則雖強力亦不能撓之。王恩洋幼承庭訓，尤其受慈母之影響較大。

王恩洋孩提之時，即對貧苦老幼之輩甚懷憐恤之心，對動物尤有哀愍之情。其母常作夜工，每至三更；他即在灶房內與豬為伴，甚相愛也。過年殺豬，必大哭一場。後聞宰豬，輒登山遠避，不忍聞其聲，見其死也。父煎魚，他見魚在釜底掙扎之慘狀，即從此不再食魚。終其一生，除蚊蚤外，未曾殺生。後至北京讀書，更開始食素。民國卅四年（1945），在重慶加入世界素食會，發表演說，宣揚仁慈，消弭殘殺，倡導祥和。對人平等守禮，未敢侮人虐物，如此種種，足見其善根之深厚。

清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，七歲的王恩洋入其父執教的私塾受啟蒙教育。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入南充縣立高等小學。在校期間，喜與人辯論，雖長輩亦不能屈之；又愛登台演說，深得師長嘉異；好聞古今英雄事迹，常引以自勵。民國二年（1913），十六歲的他考入剛開辦的南充中學，以作文見長，下筆千言不起稿。議論異於常人。課餘喜讀四書五經及宋明理學諸家著作。又欽慕

明末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之高節，購《四忠遺集》讀之。其理解力、想像力和思考力皆超出一一般人；性格寬宏大量。

民國四年(1915)，日本強迫袁世凱簽訂「二十一條」，學校開會抗議。十八歲的王恩洋以知耻、自覺、自任三義作演講勉勵同學，並作《亡國慘》一文以告縣人。此後他接觸新學，閱讀了梁啟超先生(1873-1929)的《飲冰室文集》、章士釗先生主編的《甲寅雜誌》等進步刊物，因知西學大略及天下大勢，文思益進。但他自省性懦弱寡斷，非從事政治的人才；慕梁啟超、章士釗之為人，立志以言論救世。乃專注於社會科學研究。民國五年(1916)，他中學畢業，南充縣立高等小學聘其任學監，他謝辭，改任修身課教師，引導學生去惡揚善。張瀾(1872-1955)、盧子鶴聘其任家庭教師，他也婉辭。這段時期，他所向往的是儒家思想。

民國七年(1918)，他感學識之不足，乃發憤自修，上邑中鐵峯山潛心研讀經史子籍，作《大學義疏》。又讀佛教之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愛不釋手。認為儒家言命，即西學所謂天演，在佛法則謂因果。這一認識，貫串其一生。

民國八年(1919)三月，他去北京求學。臨行時，親友為其祖錢，各勉以富貴；唯慈母誠以勿作官，學成便歸家。舟行三峽，明月在天，兩三漁火，江山如畫。五月至北京，恰值「五四」運動浪潮，學生列隊遊行。他目睹此情此景，感念國家前途危亡，不禁潸然淚下。七月，他投考北京高等師範落榜。九月，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。當時講中國哲學(主要是道家哲學和宋明理學)的是馬絳倫先生(1884-1970)，講印度哲學(包括唯識學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)的是梁漱溟先生(1893-1988)。其間，他曾一度入法文專修學校，準備赴法勤工儉學，後罷之。

當時，陳獨秀(1879-1942)、李大鈞(1889-1927)王光祈

(1892-1936)等人見失學青年處境困難，乃倡辦半工半讀的工讀互助團。意在既為失學青年謀一出路，投身勞苦生活，培養互助精神；又為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培植基層力量。王恩洋對這一作法深為贊同，積極發動在京川籍失學青年參加。民國八年十二月，天津學生復以外交事件發起愛國羣眾運動，北京高等學校全體學生上街遊行聲援。王恩洋也投身這一運動，發表演講，被反動軍警指為肇事的四十名首要份子之一，予以逮捕，地方審判廳判處其有期徒刑四月。他在獄中，看到一起被捕的部分學生產生不安以至怨尤情緒，互相輕侮，更體會到古代聖賢教人安身立命養氣不動心的重要意義。故在獄中百餘日，頗能自得，毫無怨尤，讀書靜坐，頗有會心處。出獄前六日，他將獄中所學所思所得，歸納為《唯情論》、《善惡論》。出獄後攜此二文請梁漱溟先生審閱，為梁先生所否定。然此二文，實為王恩洋先生20歲以前的哲學思想之總結。在獄中，他還讀了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著作，深覺社會有實行改革的必要。

民國九年(1920)四月，王恩洋出獄，抱着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加入工讀互助團，集眾募資。擘劃經營，並任該團第四組組長。他們開始尚可支持，一月後即因經營虧損，產品銷路不通，社會阻力大，人事不協調和經驗不足而解體。經此一番波折，他對接受外來思想進行社會改革產生了懷疑，因而決心轉向佛學的探討，希望從東方文化中尋找出一條解決社會以至人生問題的適當途徑。於是潛心研究佛教典籍，寒假期間，整日關在教室裡研讀《成唯識論》和《成唯識論述記》。

民國十年(1921)，梁漱溟先生為了便於進行學術研究，特開關印度哲學圖書室，選王恩洋負責管理。他乃利用此一便利，泛覽有關佛教瑜伽法相的著述；尤喜讀歐陽竟無大師的著作，如《瑜伽師地論序》等。而對儒家思想，因受梁漱溟的熏陶更堅定了

信仰。不久，他經梁先生介紹，前往南京支那內學院，謁見歐陽竟無大師（1871—1943），提出對唯識哲學的五大積疑（此五疑梁先生當時亦未能解答）。即：（一）阿賴耶識所緣為種子、根身、器界，此與六識所緣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為同為異？同則八識當同六識，緣無別故；異則種子、根身、器界當同真如，不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故；以唯識百法識所緣法，不列器界等故；法相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外，亦不聞另有器界等故。如八識所緣為真如者，則與大圓鏡智有何差別？（二）《阿賴耶識頌》云「恒轉如暴流」。《成唯識論》云：如暴流水，非斷非常；相續長時，有所漂溺，此識亦爾，從無始來，生滅相續，非斷非常，漂溺有情，令不出離。王恩洋認為：眾生生滅相續，即異熟相續；因此有情命者，亦稱相續。惟其生滅相續，非斷非常，是故無法無我。然則離阿賴耶識無別有情，其理決定《成唯識論》謂阿賴耶識生滅相續，漂溺有情，那麼阿賴耶識和有情是一是二？是一則不當云阿賴耶識漂溺有情；是二則阿賴耶識非常有情當常，無常漂溺有常，令不出離，此與數論自性神我之說有何分別？（三）世間生滅法，仗因托緣而得生起，因謂無始種子，緣謂偶值增上，除此因緣，別無自力。既無自力，緣何諸修行者，能依持自力，精進勤修？抑既無自力，唯仗因緣，佛法能不同於命定論否？（四）眾生可度盡否？可度盡，則諸佛功德有盡；不可度盡，則諸佛功德徒為唐捐；究竟孰是？（五）玄奘大師在印度所立真唯識量云：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，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，喻如眼識。真唯識量但可自悟，難可悟他。以所立因，但為自許，非共了故。既難悟他，胡云能立？

學識淵博的歐陽竟無立即逐條解答，且極稱力許王恩洋善學善問，已有一定功力，日後定可深入法海。而王恩洋也由於積疑頓釋，慶快平生；又得嘉許，悠然升起大歡喜心及勇猛心；遂北面頂禮歐陽竟無大師，心悅誠服地願終身執弟子禮。在支那內學

院，歐陽大師指導王恩洋先讀大小乘各家戒本，參對異同，知何者當行，何者當戒。次讀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有疑即問；歐陽大師問則必答。如此數月，王恩洋如坐春風，如曝冬日；時雨之化，沾溉深矣！對有為法頓生頓滅義、山河大地光相網義、唯識所變有情互作增上不為親緣義、法爾道理本自圓成義等等得到勝解，為他以後的佛學研究和弘法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當時呂澂、熊十力等人也就讀於支那內學院，彼此互為同學，人才濟濟，羣星璀璨！又讀清辨《掌珍論》及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，悟得真如即諸法空性空理，非離色心等別有實法名曰真如；由是對印度佛教空有二宗的爭執得以會通。

這期間，他整理並續成了歐陽竟無的講稿《佛教非宗教非哲學》。歐陽大師閱後，極為欣喜！又作《唯識答疑》、《自殺論》、《佛法真義》、《心經略解》等論文。在《自殺論》中，他認為：自殺雖亦緣於環境之逼迫，實質上乃由於內心之不安定；而內心之不安定則起於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內。人生必有所需，故有求於外；而求於外者，本以養其內也。但求取愈多，欲望愈熾；則不以外養內，反以身殉物；此之謂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內也。隨各人之欲望不同，所殉亦異。古人謂貪夫殉財，烈士殉名，夸者死權，眾庶憑生是也。既重心在外，故貪求無厭；愈無厭則不遂意事愈多，失望愈多則憂苦彌甚。漸覺天地萬物皆不容於我，最終走上絕路。倘能跳出名利圈，不捲入滔滔物欲洪流，追求心靈之淡泊寧靜，生活重心在內而不在外，則何自殺之有？！

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二月返家，八月回支那內學院。在內學院新結識了梁啟超、陳炯明（1878—1933年）、陳銘樞（1889—1965年）、李石曾、邱擘、蔣維喬（1873—1958年）等人。並遵歐陽竟無之囑，校刊了《成唯識論述記》、《成唯識論樞要》、《成唯識論學記》、《唯識了義燈》、《能顯慧日中邊論》、《仁王般若測疏》、

《順正理論》等一百數十卷要籍。

民國十二年(1923)，他作《大乘起信論》料簡》、《大乘非佛說辯》、《佛法根據》諸論文，力駁梁啟超及日本佛學家考証《大乘起信論》爲唐人偽作之說及佛法由小乘而大乘次第演變而成，非全出於佛說之論；認爲《大乘起信論》確系佛說，大乘小乘本來俱行，佛由大乘成、小乘由佛說。文出，世人大嘩，常惺法師、唐大圓居士等人咸起爭辯。王恩洋僅答常惺法師一信，其餘均未予理會。這年他又在支那內學院新結識了劉定權、景昌極、繆鳳林、馮卓、陳寬蔭、黃居素、韓文畦(1895—1983年)、蒙文通(1894—1968年)及學僧存厚、蕙庭等人。

民國十三年(1924)，他因心多煩惱而病，終日禮佛發願，行懺悔，久之又得了吐血病及瘧疾，住杭州休養三月。病中仍堅持在杭州佛教會與大勇法師一起講演佛法，聞者無不感動！八月回支那內學院。九月返家省親。

民國十四年(1925)三月，回支那內學院。當時內學院得梁啟超、陳銘樞等人的資助，正建築法相大學。七月，他被歐陽竟無任命爲法相大學主任，並主講《瑜伽真實品》及《佛學概論》。其間新結識了陶闇士等人。他的講稿《佛學概論》即作於此時，該書簡明扼要地提示了法相綱領和緣生要義，體制內容，別具風格。經支那內學院刊行後，對當時的佛學界起了相當大的影響。在印度尼西亞西里伯島經商的華僑黃聯科(福建同安人)讀了此書後來信，謂：「本人感到人生的空虛，尋求解脫之正道，出入於東西學校而無所得，時萌自殺之念，因讀此書而獲得解救」云云。此後，王恩洋先生多種著作的刊行和弘法興學活動，經濟上多有賴於黃聯科的大力資助，雖然他們兩人終生未見面。

民國十六年(1927)北伐戰爭中，法相大學駐入軍隊，被迫停

辦。他抱瘁乘船溯江而上，返回故鄉。途經重慶時，應佛學社之邀，演講《心經》；吐血復發，臥病月餘，九月始抵家。

民國十七年(1928)，爲他一生最苦之年，煩惱重、病重、母病、妻病、岳母病、中學恩師病逝，種種不如意事甚多。在貧病交困中，他仍研學不輟，通讀了《瑜伽師地論》一百卷，頗會心得。

民國十九年(1930)，他去成都，與黃肅方論學。黃云：「四面八方來時如何？」王答：「觀無我」。黃曰：「此古德打中間之義也」。兩人還就「開悟」等問題共同進行了探討。此後，黃肅方成爲王恩洋弘法事業的有力支持者。同年二月，他在南充集風場創辦了「龜山書房」，授徒講學。年底完成《佛學通釋》一書，次年由黃聯科居士出資印二千部。自1929年至1931年，王恩洋先生家中情況異常困窘，病中醫藥費、開辦「龜山書房」及維持家用等等，皆黃聯科之助也。同年四月，歐陽竟無計劃辦一「悲學」，及致信王恩洋，云：「內學以精簡研究爲主，悲學以持正開導爲的。悲學主人，非我恩洋其誰克哉？」！力勸他返南京。呂澂亦來信，請其速回支那內學院，共弘大法。他苦於吐血宿疾累發，加之關山路遙，作書辭謝之。

民國廿一年(1932)六月，他應成都佛學社之邀，前往講授《佛學解行論》、《瑜伽·真實品》、《廣四緣論》，首尾達三月之久。九月又講《八識規矩頌》。在成都期間，他遊覽了文殊院、昭覺寺、大慈寺、寶光寺、草堂寺諸名利，會見了四川佛教會會長禪安老和尚、文殊院首座圓圓法師(1879—1944年)以及黃肅方等人。

民國廿二年(1933)底，他的《人生學》完稿，在《海潮音》上連載。全書共四章，二十八萬字。第一章「人生學」，用佛學理論闡

述人生的謬執矛盾，業果相續無已，總歸於苦多樂少，故必須尋求根本解決之道。第二章「儒學大義」，認為淑善人生的初步，應以儒家修身立命，成己成人，民胞物與、天地一體之義為準則。第三章「解脫道論」，認為儒家雖能淑世而不能出世，不能得到究竟的解脫；故必須依照佛教的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斷除煩惱，才能徹底離苦得樂，超出塵世。第四章「大菩提論」，認為僅僅追求一己之解脫屬於小乘偏執；應當發菩提心，行大士行，同體大悲，不捨眾生，成就清淨法身，才是人生的最後旨趣。王恩洋先生之糅合儒佛，以佛法為體，以儒學為用；以佛法為究竟，以儒學為過渡的思想體系；集中體現於此書。故是書可說是他的代表作。

民國廿四年(1935)，撰《攝大乘論疏》。該書義本世親無性者半，自所疏義亦半；較舊釋明白詳盡，陳義不讓古人。又作《論語義疏》，洋洋十餘萬言；對孔子之學特加發揮，多超越漢宋諸家之說。

王恩洋先生認為：佛教以出世為宗旨，儒教以入世為宗旨。出世故易流於厭世，然一味厭世，而不知救世，則為聲聞獨覺之行，而非諸佛菩薩之道。入世故易流於順世。然一味順世，而不能濟世，則為凡夫俗儒之行，而非聖賢之道。儒教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志，仁以為己任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，則儒家非順世貪生也。菩薩不染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大悲利生，方便善巧，則佛家非厭世怖生也。儒教以挽救世道人心，使眾生和平安寧為宗旨，故律已甚嚴，待人惟恕。佛教以拔救有情解脫為究竟，故提倡絕情離欲，不與世同。然無菩薩之精神，則不能作入世之事業。而不能撥亂反治，使人類得以安生盡性，則佛法亦將無所施。是故二教可以交相為用，並行不悖。當今科學技術飛速發展，殺人武器亦日益厲害，環境污染日趨嚴重；尤當大闡儒佛之

至教，以救物質文明之弊，解斯民於倒懸。

民國廿五年(1936)六月，應成都佛學社之邀，前往講授《世間論》。隨講隨作，由成都佛學社印行。該書分「價值論」、「本體論」、「緣起論」、「出離論」、「無住涅槃論」五章，為《人生學》之補充。又講《攝大乘論疏》。歷時三月。聽眾踴躍，僧尼白衣，八十老翁，十歲幼童，耆年碩學，走卒販夫，莫不具足。四川佛學院院長昌圓法師率全體師生蒞臨聽講；邵從恩(1871—1949年)、盧子鶴、黃肅方、葉秉誠全家、游永康(即今之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隆蓮法師，1941年從昌圓法師出家為尼)等人亦來聞法。說法堂為之爆滿，後至者乃環立階前側聽，場面感人！講經圓滿，九月去青城、樂山游覽，在樂山烏尤寺晤遍能法師(今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)，並應邀在樂山公園講《心經》及人生哲學。旋回成都，會晤了勤研釋典的四川大學教授李炳英(1889—1957)等學界名流。後返南充。

民國廿六年(1937)一月，應重慶佛學社之邀，前往長安寺講《世間論》、《攝大乘論疏》。遍能法師聞訊，從樂山烏尤寺趕來聽講。其間王恩洋會晤了蜀中名士趙熙(1867—1948年)。四月歸家，在龜山書房講《孟子新疏》，至七月始講畢；其講義由龜山書房印行油印本。旋應重慶華岩寺之邀，講《二十唯識論疏》、《佛說無垢稱經釋》，其講義後均出油印本。聽眾以華岩寺僧侶和天台教理院學僧為主，聖觀法師(1886—1954年)、朱之洪等人亦來聞法。朱之洪對王恩洋說：將依佛法以送餘生。王恩洋開導朱之洪說：學佛不應如此消極，我們不但生應精神，尤須死得精神；菩薩悲心大願，世世代代無窮無盡，入地獄以度眾生尚可為，豈能以自度自了為宗旨耶？！朱之洪聞言振奮，自謂於佛得正願云云。王恩洋還向華岩寺方丈鐘鏡和尚介紹邱巖居士擔任天台教理院主講，遍能法師擔任教務主任，聖觀法師擔任事務主任，主客

雙方皆大歡喜。九月，應重慶佛學社之邀，前往講《緣生論》。十月歸家，在龜山書房講《辦中邊論》。十二月得歐陽竟無自重慶來信，謂支那內學院已遷來四川江津，請他明年農曆正月初七（人日）去江津會面。

王恩洋不敢怠慢，1938年一月三十日即動身，正月初三至重慶，會見了呂徵；次日抵江津，拜謁歐陽大師。同至者有呂徵、邱燦、韓文畦、蒙文通等四十餘人。

民國廿八年（1939），他在龜山書房為諸生講國學，作《老子學案》及《王國維先生之思想》二書，由黃聯科出資在上海佛學書局印行。

民國廿九年（1940）十一月，他去江津拜望歐陽大師，並會晤了梁漱溟、呂徵、陳銘樞等人，新結識了歐陽浚明等人。

民國三十年（1941）二月二日（正月初七），他至江津參加支那內學院人日聚會，與歐陽竟無、呂徵、陳銘樞、歐陽浚明、高語罕諸師友歡聚一堂。六月，上海佛學書局《佛學半月刊》請他作一「法相宗專號」，他撰寫成《法相義》、《法相體類》、《我之假立》、《緣起義相》、《共業增上》、《聖道轉依》六篇文章寄之。該六文加上後作之《敍論》及《答梅擲雲先生論緣起書》，后匯編成《法相學》一書，由華岩寺刻印流通。十一月，去江津拜望歐陽大師。與陳銘樞等人遊山，途中陳問：「宗門早悟者每寡傳，遲悟者門多盛，如岩頭雪峯者流。不知何故？」王答：「遲悟者悲增，又歷盡艱辛，知人心病，應機善巧；而早悟僅智增。」同月，在華岩寺講《瑜伽力種性品》，隨講隨疏。並在重慶錢業公會講《心經》七日。後歸龜山，作《心經通釋》，與《瑜伽力種性品疏》同由華岩寺刻印流通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1942）一月，應太虛大師（1890—1947年）之

邀，參觀重慶北碚縉雲山漢藏教理院，並與法尊法師（1902—1980年）辯論《瑜伽力種性品疏》。二月，赴內江開辦東方佛學院，院址設在聖水寺。並應自流井（今四川省自貢市）佛學社之邀，前往講《人生學》及《心經通釋》，歷時十日，其間結識了羅筱圓等人。三月底返聖水寺，講《二十唯識論》。六月回家途中，應重慶佛學之邀，講《法相學》三天。十月，應內江通俗教育館之邀，講《瑜伽力種性品》。黃肅方自成都來內江，與王恩洋、廖澤周等人商議決定，改「東方佛學院」為「東方文教研究院」。同月，王恩洋讀馮友蘭先生之《新理學》，覺得其理論體系支離破碎，不能自圓其說，謬誤百出，很不成熟，因作《〈新理學〉評論》以抨之。十一月，他去江津拜望歐陽大師期間，應重慶佛學社之請，講《瑜伽力種性品》。十二月，應瀘縣佛學社之請，講《心經》。本月，他的《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疏》完稿。全書洋洋四十餘萬言，為其生平第一巨著。唐代窺基大師（632—682年）之《成唯識論述記》而後，得此書則不孤。但黃聯科自南洋寄來的印資，由於物價飛漲，法幣貶值，折耗殆盡，以致上海佛學書局竟未能出書，王恩洋先生每引為終身憾事！又作《瑜伽師地論疏》六卷，原計劃用三年時間寫完三百餘卷，後因撰寫其它著述及政治方面的原因，終其一生也未能續作，惜哉！同年，龜山書房停辦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（1943）二月廿三日，歐陽竟無大師病逝於江津几江鎮，享年七十三歲。王恩洋聞訊，束裝趕赴江津，匍匐奔喪。王恩洋對歐陽大師一貫師事唯謹，有疑必問，辯理必明，雖受嚴斥，忠敬不渝；自1937年支那內學院遷川以來，除因父母病危的一、二年外，他每年都要去江津拜望歐陽大師幾次，並對支那內學院盡力支援，學術界頗以此稱贊其品德。支那內學院為悼念歐陽竟無大師，特出《紀念專刊》。海內賢達，咸致哀辭；門生弟子，各述功德；王恩洋也撰有長文《追念親教大師》。三月返內



江文教研究院，為清福法師（1862—1940年，曾游歷亞洲十多國）修改《源因略記》一書，改畢更其名為《壯遊記》；並撰成《清福和尚傳》。又作《實有真空中道了義論》一書。當時西藏佛教中觀派的學說傳入內地，風靡一時，以唯識為不了義；而內地許多唯識學者也不自信，附益此說。像王恩洋先生那樣始終堅持瑜伽般若的立場，以《實有真空中道了義論》作正面的答覆者，可說是極為罕見的。這對漢藏佛教教理的比較研究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五月，根據舊作《論語疏義》寫成《孔子學案》。全書分九章，第一章「絃論」，明孔子學說之源流及羣賢弟子。第二章「志學」，明孔子學說之宗旨。第三章「執禮」，明孔子之立身範世之道。第四章「求仁」，言孔子內心修養之功夫。二至四章合為孔子之倫理道德學。第五章「為政」，絃孔子政治生涯及其政治主張，即其政治學。第六章「施教」，述孔子教育之道，即其教育學。第七章「知天」，論孔子對鬼神、生死、天命等的態度和認識。第八章「作聖」，云孔子對人格和人品的昇華，自君子以至於聖人。第九章「行讚」，認為孔子的「大道」是實際的而非夢想的，並贊美其功德；以為聖人之所以不同於哲學家，其區別正在於此。從該書及其後作的《儒學中興論》等書裏，可以看出他漸有置重於儒學的傾向。該書與《實有真空中道了義論》《新理學》評論同為文教研究院印行，是為文教研究院印書之始。六月三日赴江津支那內學院參加歐陽竟無百日大祭，與呂澂、陳銘樞、黃懺華、李安、韓大載、歐陽浚明等新知舊友聚會，召開院友會，公推呂澂繼任院長；並成立理事會，由呂澂、陳銘樞、王恩洋等七人組成，協助院長工作。九月，前往自流井講《新人生哲學》、《瑜伽力種性品疏》、《八識規矩頌釋論》、《二十唯識論疏》。講經完畢，返文教研究院，撰寫《大學新疏》和《大學略釋》。十月，《孟子學案》殺青。全書計十章，第一章「絃論」，簡述孟子生平並論其學問大略。第二章「仁義」，明孟子學說之宗旨。第三章「心性」，論「性

善」、「義內」說之建立。第四章「學養」，論孟子修養省察之功。第五章「天命」，論知天立命盡性踐性之學說。第六章「人倫」，論父子君臣之道。第七章「主政」，論治國平天下之方。第八章「斥外」，述孟子對戰國時代諸子學說之批評。第九章「尚友」，贊往聖之德行，明孟學之起源。第十章「傳承」，言孟子之所教，道孟學之流派。該書與《大學新疏》等一起由文教研究院印行。十一月，應邀去重慶、瀘縣講《瑜伽真實品》、《金剛經》。旋去江津支那內學院參加校友會。十二月，《新人生哲學》、《金剛經釋論》二書完稿，請四川蓮宗院尼衆部教務長隆蓮法師擔任校對。總計該年成書九種，加上長文《追念親教大師》，共約六十萬言，為其生平著述最豐、種類最多的一年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（1944）三月，應邀去新津講經，途經成都，晤昌圓法師、邵從恩、盧子鶴諸人。到新津後，講《瑜伽力種性品》、《心經通釋》。並作《新唯識論者之思想》一文，抨擊他舊日的同窗熊十力，後刊於《文教叢刊》（文教研究院編輯出版）第一期。旋應成都四川蓮宗院之邀，講《瑜伽力種性品》，聽衆雲集。並在黃肅方家會晤了但懋辛（1886—1965年）、劉光烈（1889—1978年）、李炳英等知名人士。四月，應國立武漢大學教務長朱光潛教授之邀，前往講授《佛學概論》、《儒學概論》；並在校演講《新人生哲學》。當時武漢大學內遷樂山，王恩洋時與烏尤寺遍能法師、游子九居士（隆蓮法師之父，畢業於四川通省師範學堂）等人相過從。六月，他擬好試題，交教務處；即由聖觀法師（曾任峨眉山金頂住持、成都佛學社社長）等人陪同遊峨眉山。六日後遊山歸來，閱試卷畢，見學生成績多優異，感嘆武漢大學人才濟濟！七月歸內江文教研究院。八月返南充故里，得陳戒于信，謂四川富順余次青先生讀了王恩洋的著述後，慨然發願宏揚東方文教事業。聞文教研究院經費困難，擬為組織董事會，募集資金。

王恩洋聞訊，欣喜不已！蓋當時黃聯科先生已破產近三年矣，所捐助之功德款也隨之中斷。王恩洋立即與余次青商同在自流井召集會議，成立文教研究院董事會，得到羅筱園等人的響應資助，公推余次青為會長。共募得資金三百萬元，另加出版專項基金數十萬元，羅筱園先生捐助黃谷七十石。由是文教研究院在經濟方面得以擺脫困境，出版經費和對研究生的補助問題也相應地得到解決，開始發行《文教叢刊》。從十一月起，文教研究院每月資助支那內學院二萬元。王恩洋在自流井旭川公園講《人生哲學與佛學》，歷時三日。又去樂山、峨眉考察，準備把文教研究院遷來，朱光潛先生、遍能法師、聖觀法師、游子九居士均不辭勞苦，整日陪他尋覓新院址，最後與遍能法師選定峨眉山伏虎寺（後改變計劃，將文教研究院遷往成都西郊羅家碾）。返回內江途中經過成都，應四川蓮宗院之邀，講《金剛經》七日。歸文教研究院後，將《人生哲學與佛學》及《佛說無垢稱經釋》二書稿交內江貞利印刷生產合作社付印。十二月，應重慶佛學社之請，講《金剛經》，並會晤宗伯華教授和陳銘樞先生。旋返故鄉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二月，他從家鄉啟程，返內江文教研究院。途經遂寧，應愛道佛學社之請，講《心經通釋》，七日講畢。到內江後，即着手在文教研究院內分設研究部、修學部、問學部、函授部。三月，應邀赴資中縣城講《心經通釋》和《二十唯識論疏》，並為高中學生講《人生學》，講畢回文教研究院。六月，寫成《荀子學案》，全書分十三章，計十六萬言。七月作《論世界大戰與人類前途》，九月作《論建設中國之道》，均載於《文教叢刊》。十一月，為紀念歐陽竟無誕辰，赴江津支那內學院。途經合江，應邀至縣佛教協會會長夏之時（1887—1951年，辛亥革命元老）家中，暢談終日。在江津會晤呂澂等人後，即應請去重慶佛學社講《佛說無垢稱經釋》。同月，文教研究院應中央圖書館之

請，將《佛說無垢稱經釋》、《金剛經釋論》、《心經通釋》、《孔子學案》、《孟子學案》、《荀子學案》、《老子學案》、《儒學大義》、《人生學》、《新人生哲學》、《文教叢刊》（一、二期）分贈英國遠東非洲學院、大英博物館東方圖書館本部、牛津大學、劍橋大學、美國國會圖書館各一套，托中央圖書館轉寄。十二月，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先生（湖南人）訪問文教研究院，與王恩洋先生暢談至洽。王贈譚《人生學》及《文教叢刊》一、二期，譚先生意猶未足，乃將王恩洋的全部著述悉數購去。兩人相約在發揚東方文化事業上密切合作。

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，文教研究院遷至成都西郊羅家碾。1951年，被川西人民政府接收，遂停辦。王恩洋先生返回南充故鄉，被聘為川北行政公署及川北政協顧問。

1952年六月，他應川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員會函約，撰寫了《佛教概觀》，連載於上海《弘化月刊》，並由弘化社出版單行本。九月，川北、川西、川東、川南四行政公署撤銷，合並為四川省人民政府。王恩洋被聘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，並被選為四川省政協委員。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，他被選為理事。

1957年至1960年，他應北京中國佛學院之邀，前往講授《佛學概論》課程。在校期間，他托上海佛學書局將1942年完成的巨著——《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疏》復印了二百部，作為資料保存起來。

1961年，王恩洋先生因病返回成都。1964年二月五日，他在成都病逝，終年六十七歲。

（完）